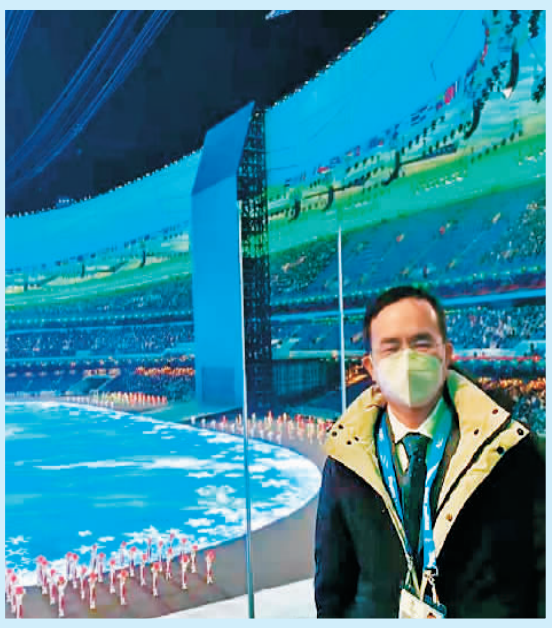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2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赵晓霞 孙亚慧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我的冬奥故事(一)

公正裁决，捍卫奥运精神

——记北京冬奥会CAS特设仲裁庭仲裁员白显月

陈远丁



白显月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

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之间万一发生了纠纷，或某一方对相关判罚不服，最终是谁拍板终审裁决呢？

在北京冬奥会上，有一个特殊的仲裁庭——2022年北京冬奥会CAS特设仲裁庭，该庭的仲裁员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公正的裁决。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白显月律师，正是北京冬奥会CAS特设仲裁庭(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里的一名仲裁员。

追求公平、正义和效率

“奥运会期间产生的或者与奥运会体育相关的争议，由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管辖。”白显月说，国际体育仲裁院总部位于瑞士洛桑，旨在处理国际体育争议。

奥运会特设仲裁庭主要解决发生在奥运会期间和奥运会开幕前10天内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争议。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白显月被任命为特设仲裁庭仲裁员，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多家仲裁机构的仲裁员。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体育尤其是奥林匹克大家庭内的跨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体育纠纷涌现。国际奥委会认识到，在奥林匹克体系范围内，建立一个专门处理体育相关纠纷且权威、高效、独立的体育争议解决机构迫在眉睫。

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推动下，1984年6月，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下属机构正式成立。随后，其独立性、中立性，特别是影响力不断提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第一次出现，之后一直沿用。

“特设仲裁庭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和效率，保护运动员的权利，捍卫奥运精神。”白显月说。

白显月介绍，其受案范围是受理和裁决奥运会期间的任何相关争议或纠纷，包括体育相关类别的主要有3大类：一是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纠纷；二是涉兴奋剂的纠纷；三是各类判罚、技术裁判处理、赛事方面的争议。

“当申请人决定针对国际奥委会、某个国家奥委会、国际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委会等机构的决定向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提起申诉之前，必须依照相关法规、体育组织条例等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之后，才可以提起在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仲裁申请。”白显月说。

成为仲裁员“道阻且长”

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的仲裁员名单中共有13名仲裁员，其中体育纠纷仲裁庭有9名，反兴奋剂仲裁庭有4名。白显月自2021年10月获选成为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仲裁员。

奥运会特设仲裁庭讲究公正、高效、灵活、免费且单独适用一套规则。在白显月看来，体育纠纷存在特殊性——运动员自身职业寿命的有限性和体育运动比赛的时效性。这就使得快速公平解决体育争议的需求更为强烈、迫切。

“效率优先是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一个突出特点。”白显月说。原则上，仲裁裁决应该在立案后24小时内做出。实践中，特设仲裁庭主席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延长。

国际体育仲裁如此重要，想成为一名国际仲裁员更是难上加难。

白显月介绍说，担任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需要具备4个条件：一是受过适当法律培训；二是在体育法、国际仲裁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三是能够熟练掌握国际体育仲裁院使用的一种官方语言；四是对体育有一般性的广泛了解。

“要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道阻且长，非一日之功。”白显月表示，一名普通律师想成为仲裁员，其从业资历、综合素质、专业能力、业界知名度等都是考量因素，需要多年积累，有时甚至需要深耕相关领域10余年以上。

另外，特设仲裁庭不会参与具体比赛的判罚，不对比赛裁判的结果本身发表意见或者表明立场，除非发现构成违反程序正义的极端例外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更不会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推翻裁判的判罚。

中国国际仲裁队伍快速成长

1996年，苏明忠教授当选为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成为第一位中国籍仲裁员。如今，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经有11名中国籍仲裁员。

2018年，白显月受国际体育仲裁院指派参加了雅加达亚运会，担任亚运会体育仲裁庭首席仲裁员。

“中国在国际体育仲裁领域越来越活跃，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能力日益增强。”白显月表示，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国际体育、大型赛事、专业活动等领域的参与和互动，中国的国际仲裁队伍也在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中国籍国际仲裁员参与国际仲裁案件，总体上呈现积极态势。

体育竞技背后，需要有法治护航。白显月认为，学界加强对体育法相关问题和体育争议的解决研究，做好法律风险防范和预案，将有效助力未来承办更多国际性体育赛事，为我国迈向体育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中国体育法的立法层面越来越跟国际接轨。在未来，体育仲裁和体育法治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期待体育法治的进步与我国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同频共振。”白显月说。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我们的脑膜可以被3D打印出来，再植入体内？

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事，科技已将它变为现实。近日，笔者来到位于广州开发区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80后”海归袁玉宇的创业人生

打印“生命”

周 颖 周自扬

袁玉宇介绍他创立的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产品（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周自扬摄

“3D打印，打出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3D打印，打出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公司展厅内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跟随企业的研发工程师邓坤学，笔者走进人工硬脑膜洁净生产车间，只见几百平方米的车间内，10余台人工硬脑膜增材制造设备陈列其中。

每台设备有一个管子一样的部件，镶嵌着10来个针头，每个针头喷射出无数纳米纤维，在收集装置上逐层堆积，形成白色薄膜状的三维仿生结构人工脑膜产品。

“薄薄一张硬脑膜产品，如何仿生人体的脑膜？”面对笔者的疑惑，邓坤学说，看起来薄薄一片，实际上它由上万层纳米纤维膜堆积而成。这种纳米纤维构成的方式结构和人体自身脑膜组织微观结构高度相似。

医疗器械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一颗明珠，也是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往往与“高精尖”联系在一起，属于知识、技术、资金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西方历经上百年积累的医疗器械巨头相比，成立于2008年的迈普医学尚属行业新秀，但在基于生物增材制造技术（俗称“生物3D打印”）的植入医疗器械新赛道，企业凭借将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实现在这一领域的“逆袭”。

“创业艰难，我有信心和底气选择坚守”

欧盟CE认证、中国专利银奖、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行走在迈普医学的展厅内，笔者看到一张张获奖证书、认证荣誉，旁边陈列着各式产品和栩栩如生的大脑模型、心脏模型等，展现出企业的技术积淀和实力。

在这里，笔者见到了公司董事长、“80后”创始人袁玉宇。他戴着眼镜、十分沉稳。回忆起创业的艰辛，他说，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没有标准、更没有可对标的范例可言”。

看好国内再生医学行业的发展，2008年，在美国攻读完生物工程博士学位的袁玉宇选择回国创业。当时，国内再生医学领域尚属空白。

“做医疗器械行业，要耐得住寂寞。一个产品从立项、动物实验、临床试验，到拿到注册证上市，需要5到8年时间。技术过硬是基础，但没有点儿情怀，也很难坚守下去。”袁玉宇说。

他告诉笔者，创业时，他们要做的产品是全新的，生产设备更是没有现成的。刚开始，团队十几个人没日没夜泡实验室，研发生产设备、琢磨产品，“很多时候走出实验室都已是凌晨”。

袁玉宇还记得，曾经整整3年，他和团队没有卖出一件产品，没赚到一分钱。幸好当时广州开发区向公司提供了办公场地并免去3年租金。同时，国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帮团队闯过了难关。

从28岁开始创业，到如今42岁，岁月将袁玉宇乌黑的头发“染”得灰白。他笑称：“感觉自己还是个年轻人，怎么头发快白完了。”创业虽然艰难，但在他看来，国内的市场条件、政策环境、创业环境等让“我有信心和底气选择坚守”。

“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去做国产的高性能医疗器械品牌”

袁玉宇向笔者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40多岁的男子因交通事故导致颅脑损伤。医生借助迈普医学设计生产的颅颌面修补材料，将其置于颅骨缺损处，帮助患者实现颅骨塑形，恢复健康。

“中国14亿多人口，医疗器械市场需求太大了。然而目前大部分医疗器械尤其是高性能医疗器械被国际巨头垄断。过去，我们在技术、人才支撑等方面跟国外确实有差距。现在，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去做国产的高性能医疗器械品牌。”袁玉宇说。

创业多年，袁玉宇感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一步，有利的政策环境，极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他举例说，此前国内医疗手术用的可吸收纤丝型止血纱，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迈普医学布局大神经外科产品线，历经8年研发出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止血产品。国家药监局专门组织专家，对这款创新产品进行审评，并确定相关标准，为产品和将来国产同类产品入市确定了规则。这鼓励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企业不仅研发出人工硬脑（脊）膜补片、颅颌面修补系统等植入医疗器械产品，还开发出多个先进制造技术平台，向口腔科、普通外科、大止血等领域拓展。

面对未来，袁玉宇充满信心：“去年我们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再过几个月，我们准备搬到新的总部大楼去，到时研发空间将扩充到上万平方米，产能还将继续扩大。”

（据新华社电）

回国就业成趋势 实体产业受追捧

海归就业呈现新特点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对留学归国人才的吸引力持续提升，加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归回国创新创业的意愿进一步加强。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涵盖海归求职岗位分布、意向薪酬、留学生求职行为特点等方面，重点关注2021年海归群体的就业形势，也能为有回国求职意愿的留学生提供有效参考。

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

《报告》显示，2021年回国求职的留学人才数量有所增长，留学生回国意愿增强。根据平台内求职数据，2020年在国内求职的留学生总人数同比增长33.9%，2021年在国内求职的留学生总人数与2020年基本持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内高校毕业生质量提高，国内招聘企业面向留学人才优先的职位数量持续走低，2019年、2020年、2021年同比增幅分别为−25.4%、−23.5%和−0.4%。分析指出，回国求职的留学人才增多，但优先职位减少，一增一减使得留学人才在国内的求职压力有所加大。

2021年求职网站面向海归所做的调研显示，超过八成的留学人才认为在国内求职难度相较从前有所提高，其中位列首位的原因是“回国海归增多，竞争加大”（占比达64%），紧随其后的原因是“国内企业对海归偏好减弱”（占比达39.5%）。

职位需求量向一线城市集中

观察招聘需求中注明留学人才优先的职位地域分布，44.5%集中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占34.4%。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相关职位海归需求量高，也吸引了更多留学人员。但从变化趋势来看，仅一线城市海归优先职位呈现增长，为7.6%，其余地区均同比下降，海归优先职位进一步向一线城市集中。

从企业招聘需求端来看，文体教育行业留学人才优先职位占比最高，为34.9%；IT互联网、商业服务、金融业的海归需求量也较为可观，留学人才优先职位分别占19.3%、13%和11.3%。不过，文体教育行业海归优先职位同比减少13.1%；IT互联网、商业服务等行业的优先岗位同比增长均超15%。

与行业分布一致，对留学人才需求较大的职业仍以语言培训、留学辅导、教务管理等教培类岗位为主。招聘需求前20位的职业还包括翻译、市场/品牌推广、银行及金融服务、运营，等等。随着留学市场回暖，2021年留学辅导岗位的需求有了大幅提高。

百度图片

实体产业就业吸引力上升

从年龄结构来看，海归人才求职年轻化特点更为明显。2021年，24岁及以下的海归求职者占平台上留学人员求职总体的三成，比2020年提高两个百分点；25−34岁求职者占62.8%，比2020年下降两个百分点。

学历结构也比2020年小幅提升，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达75.4%，比2020年提高1个百分点，本科学历占比近25%。

企业类型方面，2021年向国企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3.7%，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海归群体的求稳心态。而在行业方面，2021年向能源/矿产/环保、生产/加工/制造这两大类别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有所增长，同比增幅位居前两名，涨幅分别为11.3%和6.7%。投身实体产业及学术科研，已成为更多海归的就业选择。